

郑振铎先生与《十竹斋笺谱》

赵 前

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曾经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就，明崇祯十七年(1644)，胡正言十竹斋刻印的彩色套印本《十竹斋笺谱初集》，就是一部代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辉煌成就的重要作品。

胡正言(1584——1674)，字曰从，别号默庵道人。原籍安徽休宁，寄寓江苏上元，后居南京鸡笼山侧，因窗前栽翠竹十余竿，故命名其斋为“十竹斋”。胡氏曾官武英殿中书舍人，后弃官，过着隐逸生活。胡正言是一位多才多艺、学识渊博的出版家，胡氏一生刻书很多，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《十竹斋画谱》和《十竹斋笺谱》。《十竹斋画谱》，用短版法印成。所谓短版，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，每种颜色按其画稿形状刻成一块小木版，然后依次逐色套印，最后形成完整的彩色画面。因为镌雕的小木版形似短钉，故称短版。用这种方法印出的画面，其色彩的浓淡深浅、阴阳向背，几乎与原作无异，形神俱在，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。《十竹斋笺谱》的印制，则短版兼用拱花。所谓拱花，则是用凸版压印而成的，印出来画面突出，使天际的行云、江上的流水、禽类的翎毛、虫类的须腿、花朵的轮廓、器物的纹饰等，都一一突现在纸上，有立体效果，大有呼之欲出之感。全书四卷，有图画近300幅，均以“短版”、“拱花”为之，不仅绘刻俱精，图画所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如：拳石小景、折枝花束、楼阁古刹、乡野藩篱、商鼎周彝、编筒耒耜等等。含蓄抒情，玩味无穷。《十竹斋笺谱》中有七十三幅使用了“拱花”术。可大致分为四种情况：一、鼎豆杯盘、文房用具上的龙凤和曲波纹饰，是先用颜色印出器物的轮廓，然后拱研而成；二、杯盘瓶钵、瓮罐盆洗上凸出的白色游鱼、飞燕、花朵、叶状纹样，则是先以淡彩印出器物的局部形状，然后在未着色的部位拱研而成。三、山间流云、湖面波纹、急流浪花、鹅鹤白羽，皆拱研其间，使已印好的线条或色块与拱出的山云流水、羽毛纹饰等有机的合为一体，构成了雅趣横生的独特画面。四、《十竹斋笺谱》卷二中有“无华”八种、卷四中有“宝素”八种，均以纹版拱研于洁白的纸面，形成淡雅宁静的画面。而且图面拱研的极为清晰，如“无华”中的海棠、石榴、莞草、荷花、水仙、芙蓉、桂花、兰叶；“宝素”中的铁卷铜角、龙玺玉玦、弦板笙箫、书画轴册等。这种不着颜色的拱花画面，总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，使欣赏者有意无意间想用手去触摸它。

《十竹斋笺谱》是我们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璀璨瑰宝。它的出现，对于制笺谱图画、勾描择套、雕刻短版、套色印刷等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，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时至今日，木版水印过程中的具体分工，大体都沿袭了胡氏模式。《程氏墨苑》、《十竹斋书画谱》、《十竹斋笺谱》以及《芥子园画传》等版画佳作的外传，在国外也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。1765年前后，日本出现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版画——“浮士绘”。中、日学者一致认为，日本版画“浮士绘”的形成和发展，是由于中国精美的画谱传入日本后，对日本的画家、刻版者的创作、构图、设色等产生非常巨大、深远的影响。

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中，有一部《十竹斋笺谱》是郑振铎先生当年曾收藏过的，他在得到这部书的时候非常高兴，写了长跋以志此事：

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，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《墨苑》，胡曰从《十竹斋笺谱》及初印本《十竹斋画谱》等三伟著耳。去岁暑中，因某君介，从陶兰泉氏许，得彩色本《墨苑》，论为难得之奇遇！十载相思，一旦如愿以酬，喜慰之至，至于数夕不能安寝。《十竹斋画谱》坊肆翻刻本甚多，均粗鄙不堪入目。初印本几绝迹人间。北平图书馆前曾得初印本数册。余极健美之。孝慈生前，亦尝从琉璃厂文昌馆中某肆，得开花纸初印本三册。余出全力与之竞，竟不能夺之。后乃以十年前在杭肆所得汪氏《列女传》初印本二册与孝慈易得《竹谱》一册。又从刘贾处得白绵纸(明末之最初印本也)印《石谱》二十余页。乃亦自诧幸运不浅！至《十竹斋笺

谱》则仅获于某君处一睹之。亦孝慈物也。矜贵之至，不轻示人。然余终能设法借得，付之荣宝斋翻刻。刻至第二卷，孝慈卒；复与其嗣君达文、达武商，欲继续刊刻。惟孝慈家事极窘迫，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。《笺谱》遂归之北平图书馆。余知孝慈书出售事，尝致北平诸友，欲得其《笺谱》，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，虽曰欲之，而实则一钱莫名，并借贷之途亦绝。即达文愿见售，实亦无力得之也。幸此本终归公库，并承守和慨允续借，刊刻之工得不致中断。兰泉原亦藏有《笺谱》一部，惜已于十年前付之某氏，并他书数十种售于日本文求堂。田中君出书目时，《笺谱》竟在“目”中，且标价仅五百元。余乃作函田中，欲得之。十日后，得复函，乃云：已售去。实则，彼已自藏，不欲售出也。余叹息不已，深感无缘。后晤兰泉于天津，尚再四致叹于此书之外流不已！已闻上海狄氏处亦藏有一部。然不可得见。二月前，徐绍樵来告云：淮城一带有《笺谱》一部可得。余闻之狂喜！力促其设法购致。然久久未有消息。每过传新，几无不问及此书。绍樵云：必可得。得则必归之余，无他售理。后微闻他贾云：此书不全，仅存半部，且为黄纸印者。余私念：即得半部乃至十数页亦佳。然久未见其送来。日夜忐忑不宁，惟恐其不能得，或得之而已为有力者负之而趋。生平患得患失之心，殆无有逾于此时者。余久不购书，然于此书，自念必出全力以得之。盖余于此书过于著意，将得而复失之者数矣。此次如再失之，将无再逢之期！微闻他书已运到。然《笺谱》则仍无音耗。几日至传新，丁宁追询。绍樵云：尚未到。到则必为余留下。闻之，心稍慰。昨日微雨绵绵，直类暮春，艰于外出。绍樵突抱书二束至。匆匆翻阅，《笺谱》乃在其中。绍樵果信人也，竟为余得之！且四册俱全，各册之篇页亦多未佚去（惟佚去第二册之“如兰”十幅），足补孝慈藏本之阙页不少。并彩印本《花史》一册，顾曲斋刊《元曲》二册，索六百元，价亦不为昂。余乃欣然竭阮囊得之。时距余得彩印本《墨苑》恰为一岁余也。生平书运之佳，殆无逾于此二年者。虽困于危城劫火之中，亦不禁为一展颜也。而于绍樵则至感之！此本《笺谱》为黄绵纸印。忆孝慈本亦是黄绵纸者，恐人间未必有白绵纸本耳。一灯如豆，万籁俱寂，深夜披卷，快慰无极！复逐页持以与余翻刻本对读，于翻刻本之摹拟入神处，亦复自感此番翻刻之功不为浪掷也。

1934年的春末，在鲁迅先生的倡议下，郑振铎先生与鲁迅先生共同辑印《十竹斋笺谱》一书，郑先生委托赵万里先生从王孝慈先生手中借得藏本，请荣宝斋的师傅依然用“饴版”和“拱花”术仿原件复制。1941年夏初，经过长达七年多地努力，终于仿制成功。但此时，王孝慈先生、鲁迅先生已经先后去世。在悲喜交加之中，郑振铎先生欣然命笔，为该书仿制成功作跋文如下：

右《十竹斋笺谱》四册，重镌之工，始于民国二十三年春末，告成于三十年夏六月，此七载中，大变迭起，百举皆废。余又南北迁徙，卒卒鲜暇，故镌版之业，作辍靡恒，盖困于资力者半，而人事之乖迕，亦居其半焉，然终于斯时得竟全功。丧乱之中，艰辛备尝，同好之士初赞其议而未能睹其成者，不只一二人也。前尘回顾，悲忻交集，是乌能不纪数语以告世人，且有以慰亡友之灵也。初，鲁迅先生与余既辑印《北平笺谱》，余曰：“尝于马隅卿许见王孝慈所藏胡曰从《十竹斋笺谱》，乃我国木刻之精华，继此重镌，庶易流传，北平印工当能愉快胜任。”鲁迅先生力促其成。余北归，乃毅然托赵斐云先生假得孝慈藏本，付荣宝斋复印，然复印之工，至为繁重，荣宝斋主人杨君初有难色，强之而后可。自复绘以至刷印之工，余曾目睹，故能语其层次：初按原谱覆色分绘，就所绘者一一分刻，然犹是未拼成之板块也；印者乃对照原本逐色套印，浅深浓淡之间，毋苟毋忽，虽一丝一叶之微，罔不目注手追，惟恐失样，用力之重轻，点色之缓急，意匠经营，有逾画家。印成持较原作，几可乱真，余乃信其必有成矣。时在岁暮，第一册竣事。适孝慈至平，遂以复本贻之，是为余与孝慈订交之始。未几，隅卿亦归，每次晤言必语及版画，而于《十竹斋笺谱》尤著意焉，即微疵点污，亦必指令矫改，以期尽善。斐云与徐森玉、魏建功、向觉明诸先生亦间有参议，友朋之乐，于斯为最。适余赴沪，持是册示鲁迅，赏览之余，喜如所期。然第二册付镌后，工未及半，燕云变色，隅卿讲学北大，猝死于讲坛之上，余亦匆匆南下，以困于资，无复以余力及此，镌工几致中辍，时时以是为言者，惟鲁迅先生一人耳。迨第二册印成，先生竟亦

不及见矣。其后孝慈又故，遗书散出，此书幸归北平图书馆，可期永存。良友云亡，启余无人，日处穷乡，心力俱瘁，竟无意于续镌矣。故都沦陷后，北望烟云，弥增凄感，原书何在，尚不可知，追问其他。又逾年，忽发大愿，辑印《中国版画史》，必欲遂成诸亡友之志，拟续镌《笈谱》，收入《画史图录》之中，姑驰书斐云，询其踪迹，不意历劫竟存，且得斐云之助，第三册继付剞劂，迄今一载又半，全书毕工，微斐云之力不及此，固不只余之私衷感荷无既也。呜呼！此书虽微，亦尝饱经世变，备历存歿之故矣！抑余重有感者，二十年来，余罗致版画书不下千种，于此书最为加意，既得复失者数数，初闻涉园陶氏有旧藏，比余询及，则已与他书归日本文求堂矣。为惆怅者久之，后见文求堂书目，此书尚在，飞函商购，得复谓已他售。盖托辞如是，欲自藏也。上海狄氏亦有此书，然不可见。闻某君购得一册，余意即一册亦佳，询以能否相让？则亦已售去。孝慈故后，此书又先为北平图书馆所得，缘怪如是，余更不作收藏想矣。终假孝慈珍本，覆印毕工，慰情胜无，每自感悦。然此本中阙若干页，以无他本可补，姑置之。去冬，徐贾绍樵竟于无意中为余获此书于淮城，书至之日，乐忘晨饥。尤可欣者，孝慈本中所阙诸页，此本则一一俱在。刊书将成，余亦得偿素愿，缘遇巧合有如此者。惟镌工已就，所阙者未能补入耳。他日痛饮黄龙，持书北上，以与孝慈藏本相校勘，斐云其将何以贺余耶？补刻之举，当在彼时，云日重昭，此愿终偿，斐云知我必首肯也。（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，长乐郑振铎跋；东武王剑文书）

新中国成立后，身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仍然关心《十竹斋笈谱》的命运，1952年荣宝斋重版《十竹斋笈谱》之际，郑先生又作重印《十竹斋笈谱》序：

中国木刻画始见于868年，较欧洲早五百四十余年。彩色木刻画则于16世纪末已流行于世，至17世纪而大为发达，笱板、拱花之术相继发明，亦有先以墨色线条勾勒人物、山水、花卉之轮廓，而复套印彩色者，但总以仿北宋人没骨画法者为主，雅丽工致，旷古无伦，与当时之绘画作风血脉相通。十竹斋所镌《画谱》、《笈谱》尤为集其大成，臻彩色木刻画最精至美之境。十竹斋主人为徽人胡正言，正言字曰从，流寓金陵，以制笈、篆印为业，时亦出版他种图籍，寿至九十以上。《笈谱》印行于明崇祯十七年，即公元1644年，迄今三百余载，传本至为罕见，予尝于王孝慈先生许一遇之，时方与鲁迅先生编《北平笈谱》，知燕京刻工足胜复印之责，遂假得之付荣宝斋重刻，时历七载，乃克毕功，鲁迅、孝慈二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。今又经十余年，即此重刻之本亦不可得，荣宝斋新记欲再版行世，予尝获此谱第二部于淮上，以较前刻，凡第一部阙佚之页，一一俱在，遂加补刻，终成完帙。我国彩色木刻画具浓厚之民族形式，作风康健、晴明，或恬静若夕阳之明水，或疏朗开阔若秋日之晴空，或清丽若云林之拳石小景，或精致细腻若天方建筑之图饰，隽逸深远，温柔敦厚，表现现实或不足，而备具古典美之特色，推陈出新，取精用弘，今之作者或将有取于斯谱。（1952年5月14日，郑振铎序于北京）

爱《十竹斋笈谱》之人，莫过于郑振铎先生！

参考文献：

- 1、《胡正言生卒、定居及启用十竹斋名的时间考察》 潘天祯 《国家图书馆学刊》1995年
- 2、《西谛书话》 郑振铎著 三联书店 1983年10月出版
- 3、《中国木版水印概说》 冯鹏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出版